

黑白蕃：宋代泉州蕃商与海洋贸易

刘云 林丽珍

【摘要】自唐中期到宋初以来,泉州逐渐崛起为著名的海港城市,吸引了南海诸蕃国、西亚、东非甚至欧洲的商人到来,这些商人被当时的泉州人称为“黑白蕃”。黑蕃商主要来自今东南亚诸国、南亚次大陆印度洋沿岸国家、东非国家;白蕃商主要来自今天阿拉伯半岛海湾各国、中亚部分国家、小亚细亚、北非、西班牙南部等地。他们开辟了到达泉州的海洋航线,开展海洋贸易,为包括泉州人在内的中国人运来香药、纺织品,也从中国输出瓷器等各种生活器具、丝绸、漆器、金属器皿等。一方面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高级香药、珠宝等奢侈品,另一方面也为宋朝提供了一些财政收入。宋朝泉州黑白蕃商是10-13世纪海洋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是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建设者和践行者。

【关键词】宋朝泉州;黑白蕃商;海洋贸易;市舶收入

【作者简介】刘云,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暨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漳州 363000);林丽珍,泉州学研究所(福建泉州 362000)。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2023.4.9~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侨谱牒搜集整理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批准号:18ZDA187)阶段性成果。

泉州是宋朝著名的港口城市。其地东南临海,海岸线漫长曲折,港口众多,“近接三吴,远连二广,万骑貔貅,千艘犀象”“富商巨贾,鳞集其间”,^①吸引了海内外商人来此贸易。这些海外商人在当时被称为“蕃商”或“诸蕃”,即“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②目前学界对宋代中国海外贸易研究较多,^③其中颇有对泉州海商贸易的探察,^④但是对于留居泉州蕃商的研究则相对较少。^⑤宋代泉州黑白蕃商包括哪些国家或地区的商人?他们如何开展海洋贸易?他们对宋代泉州的海洋贸易做了哪些贡献?这些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一、宋代泉州的主要外贸港口、潮汐与外来航线

宋代海外蕃商经过远洋航行后,首先到达中国南方大港广州。虽然广州经济繁华,但广南东西路的经济总量有限,奢侈品消费能力也有限,所以蕃商不满足于只能在广州交易,遂向广南东路市舶司建议,希望宋朝能够放宽他们的贸易范围。广南东路市舶司向朝廷报告说,“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

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巧通入他州及京东贩易”。崇宁三年(1104),宋廷诏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⑥即崇宁三年市舶法扩大了蕃商在中国的贸易范围,他们可以合法前往其他州郡销售香药等外来奢侈品,购买当地产品,而其他州郡的百姓也可以直接向南洋蕃商购买香药等物。其中,泉州是南洋蕃商比较向往的港口城市之一。

宋代泉州经济圈辐射福建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两浙路部分地区,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北宋蔡襄两任泉州知州,他指出泉州“州称都会,居有版籍之繁”。^⑦北宋后期,福州人郑侠(1041-1119)了解到泉州“维平海之大州,乃七闽之都会。土疆差广,齿籍至繁”。^⑧两宋之际的张纲(1083-1166)认为,“泉之地并海,蛮胡贾人,舶交其中,故货通而民富”。^⑨南宋乾道四年(1168),王十朋(1112-1171)为泉州知州,在谢表中称泉州“乃富商大贾往来之会”。^⑩真德秀(1178-1235)指出,“泉之为州,控临大海,实闽陬要会之地”。^⑪嘉熙元年(1237),许应

龙(1168-1248)《刘炜叔知泉州制》云,“温陵大藩,民繁事夥,蛮舶萃聚,财货浩穰”。^⑫刘克庄(1187-1269)认为,“温陵邑屋繁雄,军府殷实,素号闽之乐土”。^⑬元人李士瞻(1313-1367)写信给泉州官员说,“夫泉州为郡,控带番广,海舶之所集,珍货之所聚,视七路尤为要冲”。^⑭以上多位宋元士人的观点,集中说明泉州的主要特点有这些:临海,位置重要,海洋贸易发达,财源富足。

(一)宋代泉州的主要港口

宋朝泉州下辖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德化、永春七县,其中晋江、南安、惠安、同安临海。宋朝泉州诸港南起围头湾(或称围头澳),外有料罗海心、围头海心,中经深沪湾,北至泉州湾,其主要港口有泉州湾的刺桐港与法石港、晋江石湖港、惠安县小兜港(今泉州崇武港),深沪湾的永宁港,南边围头湾的安海港、石井港、围头港等。^⑮至宋末元初,后渚港开始兴起。^⑯

宋朝泉州基本上是港寨合一,即于海边交通要害处,设立水寨,安排士兵驻扎,引导蕃船到市舶司申报抽解,并维护海上秩序。宋朝初年,朝廷在泉州下辖的晋江石湖、惠安小兜、南安石井、潘山、德化云峰里设有5个士兵巡检司寨,每寨约300人,员额1500余人。其中晋江石湖、惠安小兜、南安石井为“风帆浪舶往来冲集要害之处”,为沿海诸州军“控扼地方”,设置巡检“防遏盗贼”。^⑰泉州湾的宝林新旧两寨、法石寨及深沪湾的永宁寨属于殿前司左翼水军管辖。^⑱

刺桐港为泉州城南环城河的内港,亦称“南关港”,^⑲所以有人认为,“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⑳晋江绕泉州城西北而来,与东南而来的泉州湾潮汐交汇在宋代的镇南门、通津门(即水门)一带。开元六年(718),刺史冯仁知“缘州郭无县”,向朝廷请求析出南安县东部部分地区,设立晋江县,^㉑获得朝廷批准。晋江县在晋江南1里处,县治与泉州州治同在城中。开元二十九年,泉州别驾赵颐贞“凿沟通舟楫至城下”,^㉒即通过开凿人工河流,把泉州城内河水系与晋江连通,扩大了城内外商品运输体系,泉州城初具港口城市的雏形。随后,王审知、留从效等先后修建泉州子城、罗城。南唐保大年间(943-957),留从效修建

罗城,方圆20里,设有7个城门,东门为仁风门,西门为义成门,南门为镇南门,北门为朝天门,东南门为通淮门,西南门为临漳门、通津门。南宋宝庆元年(1225),泉州知州游九功(1163-1243)“始筑瓮门,于城南外筑翼城,东自浯浦,西抵甘棠桥,沿江为蔽”。^㉓罗城在镇南桥内,桥跨南壕,“直东抵通淮门,直西抵临漳门”,^㉔跨河为桥,“流东西,贯直南,并受潮汐”。这使得泉州成为成熟的港口城市,“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揭开了泉州成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序幕。^㉕

法石港倚靠法石寨,距离泉州城15里,“系是里巷,去城不远”“正系咽喉之地”“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为泉州城“防海要冲之地”。法石港处江海交汇处,“水面广阔”,港深波静,适合停泊各类海舶,为南关港的外港。^㉖现代考古发现,法石港出海口一带有江口码头,尚存文兴渡、美山渡两个渡口遗址。^㉗

围头湾距离泉州城120多里,“正阨大海,南北洋舟船往来必泊之地。旁有支港可达石井,其势甚要”,^㉘位置重要,同时也是天然良港。从现代来看,围头湾“呈葫芦状,前丰后削,湾口深广,半腰以下为狭长港道,从湾口向内进深达60华里以上,能住泊大批船只”,^㉙具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海面辽阔,“视诸湾澳为大,往来舟船可以久泊”,可以停泊大量船只,是船舶南来北往的“必泊之地”。第二,利于避风,“其湾澳深阔,可以避风”,无论是商船还是“贼船”“自南北洋经过者,无不于此稍泊”。第三,背靠高广山,山上有淡水,方便南来北往的船舶补充淡水。第四,高广山附近形成了一些颇具规模的滨海小市镇,“当处居民亦多与贼徒交通贸易,酒食店肆,色色有之”。^㉚围头湾包含围头港、石井港、东石澳、安海港等,其中石井港最为重要。^㉛安海各条南流的河流汇于南安石井江,石井江则“由海门转弯而入安海,以通南北之商船,此则安海之要枢也”。^㉜围头湾壁东北侧,最外侧为围头半岛,最里为石井港,通过石井港海门,中间为东石澳,直达海水与安海诸水交汇处的安海港,“潮汐而至于安海港”。^㉝安海,古称湾海,“以其海九十九曲也”。^㉞唐安金藏(?—766)的后代安连济在宋朝开宝年间(968-976)移居湾海,所以改称“安海”,时为泉州南安县开建乡修仁里安海

市。安海在北宋初年就有不小的聚落,形成两市,东为旧市,西为新市,南边临海。元祐二年(1087)冬十月,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置司泉州后,^⑤大量船舶开到泉州海域进行贸易,其中就有一些来到石井港。泉州知州派都税务官吏到此收税,称为“石井津”。^⑥建炎四年(1130),因安海“新旧市竞利相戕”,泉州知州向朝廷申请设镇置监官进行管理,^⑦遂在安海市设立石井镇,以迪功郎一员充监税。^⑧

小兜港位于惠安县东南沿海突出部,在泉州港东北方,距离泉州城80里,北临湄洲湾,南接泉州湾,东临台湾海峡。岬角地势平坦,海面开阔。^⑨宋朝廷在此设有小兜寨,即小兜巡检司。其海道“自北洋入本州界首,为控扼之所”“正系本州门户”,^⑩是东北诸夷海舶进入泉州港,也是北方海舶南下的必经之路,是宋朝泉州港北边门户。

石湖港在晋江与洛阳江交汇处入海口,居泉州湾口南岸,距泉州城东南50里,是宋朝泉州港的外港,^⑪“旧名海口南镇,与北镇相对。城下之水,从此入海。潮汐所通,实为本府内门。岱屿一山,屹立其中,土人称为岱屿门,乃近城控扼至要之地”。^⑫周边地势平坦,地域辽阔,有很多民户居住。石湖港背靠石湖山,海港前方除了上文提到的“石湖镇两山之间”的岱屿(即宋元以后的蚶江港),还有“石湖港湍流分汇之处”的白屿。^⑬港西边背风,为一个半月形的海湾,而且有一条长达3公里的深水航道延伸到岱屿。海床为平底花岗岩结构,常年水深18米,退潮时最浅深度14米,涨潮时最深水深达36米。航道从石湖外屿到北线,海滩宽2000多米,长达4海里,可供宋朝至少5000料以上的船舶停靠。^⑭石湖港近岸诸岛屿也是花岗岩岛,元祐年间,应该是在泉州市舶司设立后,侍禁傅璠在礁石岛屿与岸线之间修建了70多米长的栈桥,称为“通济桥”,^⑮这有利于船舶停靠以及水陆运输的转换。

宋代泉州诸港构成了“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主要贸易平台,黑白诸蕃商通过海洋航路到达这里,开始他们期盼已久的海洋贸易。

(二)宋代泉州的潮汐

在长期的航海活动中,泉州民众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对海洋潮汐、洋流、风信、航线等有了较为

具体而详细的了解,这主要体现在地方志中对潮候、潮汐的记载。现存最早记载泉州及其属县潮候、潮汐的地方志,当属明弘治四年(1491)刊印的《八闽通志》。晋江县、南安县、同安县和惠安县的潮候与潮汐记载如下:

泉州府晋江县:海在府城东南正东。海道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鼉鬣屿,又二日至琉球国。潮汐自晋江、洛阳江入县境。烟浦、陈埭埔、玉栏浦、植壁港、安海港诸处皆通潮。其潮候初一、初二、十六、十七日俱巳亥时至;初三、初四、初五、十八、十九、二十日俱子午时至;初六、二十一日俱丑未时至;初七、初八、初九、初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俱寅申时至;十一、十二、二十六、二十七日俱卯酉时至;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俱辰戌时至。

南安县:潮汐入县境,双溪口、金鸡桥俱通晋江潮汐。潮大至双溪口,潮小至金鸡桥。

同安县:海在县东南。县境双溪通潮。

惠安县:海在县东南。县境添崎港、峰崎港、网川澳、仪场澳、大岞澳、獭窟澳俱通潮汐。^⑯

这虽然是明中叶的记载,但距离宋亡不过200余年,按照自然规律,潮候与潮汐应该没什么变化。从上述潮汐时刻表可以看出,泉州的潮汐属于正规的半日潮。^⑰

海潮进入泉州各条通潮江河,跟海洋潮候稍有差别。以安海港为例,安海港的潮候与泉州其他港澳相比,“去流有远近,纳潮有缓急”。^⑱这些纳潮港澳的潮候大致如下:

洛阳江、安海港缓海潮三刻;浯江、笋江、东西溪又缓三刻;金溪又缓一刻;双溪又缓一刻。此诸潮先后之大略也。^⑲

当然,这些泉州海域的海洋潮候及泉州所属纳潮港澳的潮候,应该也为海外蕃商所掌握所了解,使他们可以根据潮汐,比较便利地驾驭海舶,在泉州海域进行贸易。

(三)宋代南洋诸蕃到泉州的航线

汉代以来,我国便与南洋诸蕃国贸易往来。至唐朝中后期,泉州港开始崛起,南洋蕃商也开始到达

泉州进行海洋贸易,或以泉州为中转港前往福州、杭州、扬州等地。唐朝嗣圣元年(684),胡商康没遮登陆漳浦县温源溪(今属漳州市漳浦县佛昙镇),并进行交易,^⑤随后可能经过泉州北上。康没遮之康姓属昭武九姓之一,是唐代比较著名的胡商群体之一。^⑥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去世的扬州波斯胡商李摩呼禄(760-835)“舟航赴此,卜宅安居”,^⑦也有人认为可能经过泉州而至扬州。大和八年二月诏令云:“南海蕃船……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迹未安,率税犹重,恩宥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通,不得重加率税。”^⑧这里的“福建”,应该指的是福建观察使所在的福州及其诸海港。光启元年(885)以来,王潮、王审邽等先后担任泉州刺史,“息兵养民”“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⑨天祐元年(904),王审邽之子王延彬(886-930)被任命为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⑩这说明,从9世纪80年代至10世纪初,泉州官员比较重视招徕蛮舶蕃商,泉州诸港的海洋贸易已经初具规模。担任泉州刺史二十年后,王延彬觉得自己从海洋贸易中获取了足够的财力,于是想绕过王审知,直接跟汴州朝廷联系。^⑪虽然王延彬最后没有成功,但仍可从中看出当时泉州官府舶脚收入之丰厚,以及泉州港海洋贸易之发达;我们还可以推断,南洋诸蕃商应该已经开辟了直达泉州的海洋航路,如王审知掌权后,重视招来南洋诸蕃商,即“佛齐诸国,绥之以德,架浪自东,骤山拱北”。^⑫

入宋,南洋诸蕃商更加频繁地前往泉州贸易。太平兴国初年,“乃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⑬神宗熙宁七年(1074),朝廷诏令,“诸泉、福缘海州有南蕃海南物货船到,并取公据验认,如已经抽买,有税务给到回引,即许通行。若无照证及买得未经抽买物货,即押赴随近市舶司勘验施行”。^⑭这说明,在福建路市舶司正式设立前13年,南洋诸蕃商船就经常到达泉州进行贸易,并且开辟了更多直达泉州的海洋贸易航线,我们可以从周去非(1134-1189)《岭外代答》中找到相关记载:

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趾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阇婆之半。而三佛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祸不测。幸泊于吾境,犹有保甲之法。苟泊外国,则人货俱没。若夫默伽国、勿斯里等国,其远也,不知其几万里矣。^⑮

根据周去非自序,《岭外代答》成书于淳熙五年(1178),是他本人“试尉桂林,分教宁越”期间“耳目所治”“随事笔记”而成。^⑯这距离福建路市舶司设立已经过去100多年了。周去非在广南西路桂州、钦州这些相对偏远的地方都能比较容易听到关于南海诸蕃国航海知识,这只能说明,南洋诸蕃国的远洋航线已经为很多士大夫所熟悉。据周去非记载,南洋诸蕃、印度洋诸国、东非沿海诸国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国都有到泉州的海洋航线。其中,三佛齐是南洋诸蕃的航运中心、贸易中心。诸蕃国到泉州航线大略如下:

1. 三佛齐到泉州航线:三佛齐(正北行)→上下竺屿(今马来半岛东岸外奥尔岛,即Pulau Aur)→交趾洋(东行)→绕过海南岛→惠州甲子门→潮州海域→漳州海域→泉州。

2. 阇婆到泉州航线:阇婆(西北行)→十二子石(今加里曼丹岛西爪哇海北卡里马塔群岛)→上下竺屿→交趾洋(东行)→绕过海南岛→惠州甲子门→潮州海域→漳州海域→泉州。

3. 占城、真腊等中南半岛诸国到泉州航线:占城/真腊(东北行)→交趾洋(东行)→绕过海南岛→惠州甲子门→潮州海域→漳州海域→泉州。

4. 印度洋沿岸诸国、东非沿海诸国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国到泉州航线:印度洋沿岸诸国、东非沿海诸国以及西亚—地中海沿岸诸国→故临国→三佛齐(正北行)→上下竺屿→交趾洋(东行)→绕过海南

岛→惠州甲子门→潮州海域→漳州海域→泉州。

5. 菲律宾群岛到泉州航线：^⑤菲律宾群岛→巴士海峡→台湾岛→澎湖岛→泉州。

正是循着这些海洋航路，南洋黑白蕃商载着香料，来到泉州，有部分成为泉州的“住唐”蕃商。

二、宋代泉州黑白蕃商的构成

由于泉州有良好的港口条件，又是宋代中国海外贸易物资的集散地，^⑥南洋往泉州航路颇为黑白蕃商熟悉，所以能够吸引大批外国商人来到泉州。福建路市舶司设立后，泉州“麇肆杂四方之俗，航海皆异国之商”。^⑦绍兴六年(1136)，刘子羽以徽猷阁待制知泉州，看到泉州“番商杂居”。^⑧周紫芝(1082-1155)说泉州“海国蛮珍聚”。^⑨绍定五年(1232)，徽猷阁学士、知泉州真德秀指出，“盖泉之为州，蛮舶萃焉，犀珠宝货，见者兴羨”。^⑩刘克庄也认为泉州“以番舶为命”。^⑪蕃舶丛集，诸多蕃商来到泉州。楼钥(1137-1213)称泉州“金山珠海，磊砢乎万宝之藏；鞶屨航琛，奔走乎百蛮之广。楼船举帆而过肆，贾胡交舶以候风”；^⑫林之奇记云，“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三佛齐其一也”，^⑬海外经常到达泉州贸易的国家有10多个，三佛齐居其一。

(一)宋代南洋黑蕃商

现代考古研究表明，“现今(1992年)东南亚4亿居民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一个生物群，可以将其称之为南蒙古人种。在这个群体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印度尼西亚境内，当一个人从北部迁到南部时，皮肤颜色逐渐变黑，面部和颌部不断增大，从西部迁往东部者同样如此。南蒙古人种之外的东南亚土著居民，只有马来半岛中部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以及聚居在新几内亚岛及其周围的美拉尼西亚人”。^⑭换言之，根据现代考古发现，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11国的4亿居民，基本上都是宋朝语境里的南洋黑蕃商，这可以从唐宋文献中得到印证。

1. 宋代占城国及以南真腊、蒲甘、三佛齐、阇婆等国与其附属国。占城，指今天越南的中部及南部，存在时间为东汉初平三年(192)至明成化七年(1471)，^⑮其中东汉至唐乾符三年(876)称为“林邑”，^⑯唐乾符四年开始称为“占城”。^⑰据《旧唐书》，林邑国“其人拳发色黑”，又云“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

仑’”。^⑱换言之，唐朝“林邑以南”的婆利国、盘盘国、真腊国、陀洹国、诃陵国、堕和罗国、堕婆登国等，实际上就是宋朝占城以南的南洋诸蕃，如真腊、蒲甘、三佛齐、阇婆等国及其附属国，应该都是“卷发黑身”的“昆仑”之属。这种“昆仑”在北宋时期的两广路被称为“鬼奴”或“昆仑奴”：

广中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言语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谓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鬃而黄，有牝牡，生海外诸山中。食生物，采得时与火食饲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缘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蓄。久蓄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⑲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一种“鬼奴”也称为“野人”，他们“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鬃而黄……生海外诸山中”；另有一种近海野人，被称为“昆仑奴”，显然就是唐朝林邑及其以南诸国“卷发黑身”的昆仑。

这些“昆仑”之所以被卖到宋朝两广路一带，大概跟占城的人口掠卖习俗有关。《岭外代答》云，占城国“俗本好剽掠”“国无市肆，地广人少，多买奴婢，舶舟以人为货”；^⑳《诸蕃志》也记载占城国“买人为奴婢，每一男子鬻金三两，准香货酬之”。^㉑至明前期，占城“国人男子蓬头，妇人撮髻脑后，身体俱墨”。^㉒

除了占城国，真腊国也是唐朝时期的“‘昆仑’之类”。^㉓真腊国在唐以前称为扶南国，宋朝史籍虽然没有提到真腊国人的肤色，但据元朝周达观(1266-1346)的观察，真腊国居住在海岛村落寻常闾巷的民众“粗丑而甚黑”。^㉔另外，麻逸国为Mait的对译，是民都洛岛(Mindoro)的旧称，为“黑人之地”的意思。^㉕三屿有海胆人，是吕宋、民都洛诸岛中身材矮小、黑色皮肤的土著。^㉖

2. 印度洋沿岸的南毗、故临等国。南毗国，我国古代航海家对古里佛国(Calikut)的通称，即今印度洋马拉巴尔海岸印度喀拉拉邦(State of Kelara)的科泽科德(Calicut)。^㉗《诸蕃志》载南毗国“国人紫色，耳轮垂肩”，有故临、胡茶辣等10个属国；赵汝适在泉州接触到的商人时罗巴、智力干父子就来自南毗国。^㉘其国人的肤色为紫色，应该也是属于黑色人种。而南毗国管下的细兰国，即今斯里兰卡，“国人肌肤甚黑，

以缦缠身,露顶跣足,以手掬饭,器皿用铜”。^⑥

故临,是指印度半岛西南端其罗(Cheras)或杰尔(Keralas)之奎隆港(Quilon),今属印度喀拉拉邦。据周去非记载,“其国人黑色,身缠白布,须发伸直,露头撮髻,穿红皮履,如画罗汉脚踏者”“国人好奉事佛”。^⑦换言之,从南洋来泉州的黑蕃商,应该有故临的。

3. 非洲东海岸诸国。主要有今东非的几个大食属国,如层拔(即波斯人建立的Zanzibar帝国,今东非坦桑尼亚、肯尼亚等地)、弼琶啰(今索马里柏培拉)、中理国(今亚丁湾索马里角米朱蒂尼亚)^⑧等地,属于白人和黑人混居区。

(二)宋代南洋白蕃商

据目前所见材料,宋代泉州的白蕃商应该主要来自大食国及其属国、地中海南岸国家。

“白蕃”一词仅见于《程史》。岳珂(1183—1243)提到广州有很多国外海商杂居在一起,其中身价最豪富的蒲姓海商,“号白蕃人,本占城之贵人也”。^⑨岳珂说蒲姓白蕃原本是占城国的贵人,这可能是从三佛齐国过去的。林之奇云,南宋绍兴末年,“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⑩可见蒲姓蕃商基本上是白蕃商。其中应该包括三佛齐蒲姓朝贡使者、蕃商,如唐天祐元年使者都蕃长蒲河栗立,宋建隆二年(961)使者蒲葭,开宝八年使者蒲阇汉,太平兴国八年(983)使者蒲押陀罗,端拱元年(988)使者蒲押陀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副使蒲婆蓝,天禧元年(1017)使者蒲谋西,天圣六年(1028)使者蒲押陀罗歇等。^⑪另外,印度洋沿岸国家也有白人,如南毗国属国胡茶辣,在今阿拉伯海坎贝湾与卡奇湾之间的印度古吉拉特邦(State of Guzerat)一带。该国信奉婆罗门教,“国人白净,男女皆穴耳,坠重环”。^⑫胡茶辣国人男女都长得白净,该国到达泉州的海商应该就是所谓的“白蕃商”。

除了三佛齐、占城等国,宋朝白蕃商的最大来源地应该是大食国。大食国,622年建国于原波斯国西部,信奉伊斯兰教,以穆罕默德为先知。到8世纪上半叶,大食国成为地跨亚非欧的帝国。大食国物产丰富,其商人活跃于三佛齐、蓝里、中国等地。宋代朝贡贸易中,来自大食国的蒲姓使者、蕃商很多,如开宝九年使者蒲希密,太平兴国二年使者蒲思那、判

官蒲啰,淳化四年(993)舶主蒲希密,至道元年(995)舶主蒲押陀黎,景德元年(1004)蕃客蒲加心,天禧三年使者蒲麻勿陀婆离、副使蒲加心,至和、嘉祐间(1054—1063)蕃客首领蒲沙乙,熙宁六年都蕃首保顺郎将蒲陀婆离慈,等等。^⑬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大食海商施那帏居住在泉南,与三佛齐海商蒲霞辛等一起修建了泉州蕃商公墓。^⑭嘉定七年(1214),岳珂记云,“泉亦有舶獠,曰‘尸罗围’,货乙于蒲,近家亦荡析”。^⑮岳珂所记载的泉州舶獠“尸罗围”就是林之奇提到的“施那帏”,也是下文提到的“思莲国”,或译为“撒那威”,即Siraf或Shilave之对译。杨博文认为,伊斯兰教国家习俗,往往以居住地作为其人的称谓。^⑯

大食国的属国主要有麻啰抹(Marib,今也门马里卜市)、施曷(Shihr,今也门席赫尔港)、白莲(即巴林)、伽力吉(马可波罗记作Calatu,今阿曼苏哈尔港至马斯喀特一带,毁于地震)、^⑰勿拔(今阿曼米尔巴特)、^⑱瓮篱(即阿曼)、奴发(Dhofar,今属阿曼佐法儿省)、伊禄(即伊拉克)、白达(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思莲(Siraf,亦称“施那帏”等,今属伊朗法尔斯省塔黑里)、哑四包闲(Ispahan,今属伊朗伊斯法罕市)、积吉(即今伊朗马什哈德)、记施(今属波斯湾东岸伊朗布什尔省)、甘眉(即霍尔木兹)、麻嘉(即今沙特阿拉伯麦加)、弼斯啰(今伊拉克巴士拉市)、勿斯离(今伊拉克摩苏尔市)、勿斯里国(即Misr的异译,今埃及)、毗喏耶(原罗马帝国北非属地,阿拉伯人称为Maghrib,今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等地)、啰施美(波斯语Khwarizm对译,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中部城市基发)、蒲花罗(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木俱兰(Makran,今属巴基斯坦莫克兰市)、^⑲吉瓷尼(即962年Alptigin建立的国家,范围涵盖今阿富汗、巴基斯坦旁遮普、伊拉克部分地区,亡于1186年)等20多个。大食国“本波斯之别种”,^⑳其国“男儿色黑多须,鼻大而长,似婆罗门;妇人白皙”。^㉑其属国如记施国国人外貌白净,“身長八尺,披发打缠,缠长八尺,半缠于头,半垂于背,衣番衫,缴缦布,蹶红皮鞋”。^㉒在宋朝泉州人看来,大食商人自然是典型的白蕃商。另外,芦眉国(今土耳其境内)、^㉓木兰皮国(即当时非洲北部与西班牙南部穆拉比特帝国)、^㉔斯加里野国(今意大利西西里岛)^㉕等国人也属于“白蕃”。

综上,宋代泉州黑白蕃商中,黑蕃商主要来自太平洋沿岸的南洋诸蕃国、南亚次大陆印度洋沿岸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白蕃商主要来自三佛齐、大食国及其属国、北非、西班牙南部、土耳其等地。

三、宋代泉州黑白蕃商的海洋贸易与官府收入

宋代泉州黑白蕃商成为泉州与其原籍地的经济纽带。一方面,他们从泉州发舶,为原籍地送去当地需要的中国产品;同时,他们也根据泉州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从原籍地运来大量香药。这成为当时世界海洋贸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输往南洋诸蕃的商品

以《诸蕃志》为例,中国输往南洋诸蕃的商品主要有:

1. 生活生产用具:凉伞、绢伞、雨伞、草席、扇、网坠(含铅网坠等)、牙臂环、铁针。^⑩
2. 生活器具:漆器(含漆碗碟等)、瓷器(含青白瓷器等)、金银器皿、铁鼎、琉璃珠(含五色琉璃珠等)、琉璃瓶子、五色烧珠。^⑪
3. 金属:金(含货金等)、银、铅、锡(含灰锡、白锡等)、铁、赤铜。^⑫
4. 食品:酒、糖、米、麦、粗盐。^⑬
5. 丝织品:绢(含缣绢、五色缣绢、五色绢等)、假锦、锦绫、皂绫、建阳锦、五色茸(绒)。^⑭
6. 药品:大黄、樟脑、干良姜、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乌铅。^⑮
7. 化妆品:胭脂。^⑯

(二)诸蕃输往中国的商品

1. 香药^⑰

(1)香料:脑子(含梅花脑、速脑、金脚脑、米脑等)、笈香、速香、沉香、暂速细香、粗熟香、粗细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白豆蔻、肉豆蔻、乳香、蔷薇水、木香、苏合油、茴香、龙涎香、安息香。

(2)药物:黄蜡、瑇瑁、腥肭脐、梔子花、没药、芦荟、阿魏、珊瑚树、苏木、木兰皮、萆澄茄、胡椒、硫黄、红花、血竭、无名异、摩娑石、没石子、药槟榔。

2. 珠宝象牙:象牙、犀角、真珠、琥珀、猫儿睛、红玻璃、青红宝珠、砗磲、上等碾花琉璃。^⑱
3. 珍稀动物及羽毛:孔雀、红鹦鹉、白鹦鹉、翠毛。^⑲
4. 诸蕃纺织品:吉贝、白布、花布、丝纹布、织金

软锦、驼毛布、兜罗锦、异缎、绞绖、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于达布。^⑳

5. 珍稀木材:乌楠木。^㉑
6. 生活用品:白氎簟、花簟。^㉒
7. 金属:水银、白铜、生银。^㉓

据以上材料,从泉州输出的中国商品主要有七大类,包括雨伞、凉席、扇子、铁针、渔网网坠等常见生活生产用具,青白瓷器、金银器皿、漆器等生活器具,金银铅锡等金属,米麦糖盐酒等食品,绢、锦、绫等丝绸制品,中国药物11种,还有作为化妆品的胭脂,这应该可以算是中国出口的第一种化妆品。诸蕃输往中国泉州等地的商品也大致可以分为七大类,最大宗的香药有39种,珠宝象牙等奢侈品有9种,珍稀动物3种,诸蕃纺织品12种,珍稀木材1种,生活用品2种,金属3种。

(三)宋朝泉州官府的市舶收入

宋朝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㉔可以为皇室和朝廷提供名贵的香药,也可以给国家财政带来收入,即所谓“市舶之利颇助国用”。^㉕前文提及,元祐二年冬十月福建路提举市舶司置司泉州,不久设怀远驿招徕蕃商。政和五年(1115),福建路提举市舶司招到占城、罗斛两国进奉,“招诱抽买宝货增羨”,时任福建路提举市舶使施述受赐“与转一官”。^㉖建炎二年五月,朝廷重建福建路与两浙路提举市舶司,“赐度牒直三十万缗为博易本”,^㉗这些博易本由市舶司交给纲首去收息钱。绍兴六年十二月,福建路提举市舶司上言,蕃货纲首蔡景芳“招诱贩到物货,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四年,收净利钱九十八万余贯”,^㉘这98万余贯净利钱是福建路市舶司将博易本交给蕃货纲首经营所得的息钱。同年(绍兴六年),泉州知州连南夫上奏,大食蕃客啰辛贩到的乳香价值达30万缗。^㉙随后,宋朝调整蕃货香药抽分法令:“(绍兴)十四年,命蕃商之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㉚绍兴十七年十一月四日,诏令闽、浙、广三路市舶司:“今后蕃商贩到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并依旧抽解一分,余数依旧法施行”。^㉛对照绍兴十一年“重行裁定市舶香药名色”,这“龙脑、沉香、丁香、白豆蔻四色”正属于“香药名色”清单中细色香药的种类。^㉜至绍兴二十九年,御史台检法

官向皇帝报告说,闽、浙、广三路市舶司每年抽解与和买上交户部的收入约为200万缗。这个市舶收入本来就在常规赋税之外,使得皇帝和朝廷在资金使用上更为充裕。^⑫因此,早在绍兴五年,胡寅(1098-1156)即云“惟泉南负海,有舶市之饶”。^⑬

乾道三年,朝廷下令在漳州、泉州、福州和兴化军正常的上供钱物中,截拨25万贯钱给福建路市舶司作为抽买香药的本钱。^⑭但是,这种香药抽买逐渐变为博买,即市舶司全部收购香药后,高价出售。开禧元年(1205),有官员指出,泉州等市舶司“招买乳香,缘舶司匮乏,不随时支还本钱,或官吏除克,致有规避博买,诈作飘风,前来明、秀、江阴舶司,巧作他物抽解收税私卖,揜夺国课”。^⑮这极大地影响了市舶收入,同时也打击了黑白蕃商的积极性,他们不再愿意进入泉州贸易。嘉定十年,真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⑯当时“商人畏重征,苦官吏和买,至者绝少。公醵税额,戒官吏毋得买一物。虽诸台委倖属市物,必申州始得奉行。是年舶至者十有八,明年二十有四,又明年三十有六。征税之人,遂及绍熙旧额”。^⑰但是,真德秀去职后,泉州市舶又每况愈下。至南宋末,泉州市舶司为“以互市至泉州”^⑱的西域人蒲寿庚所控制。

宋代泉州港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也是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泉州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扼晋江下游,水道深邃,港湾曲折,水陆交通便利,是一个天然良港。它是我国海岸线由东西向南北的转折点,介于东海、南海两大航路中心点,也是连接广州与杭州的中点,处于世界性海上贸易圈之中,便于兼营南海、印度洋与日本、朝鲜地区贸易。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与“北洋”“东洋”“南洋”“西洋”实现了连接与互动。

宋朝泉州“民数倚于商”,且“航海皆异国之商”,^⑲黑白蕃商就是属于航海而来的“异国之商”。黑蕃商主要来自今东南亚诸国、南亚次大陆印度洋沿岸国家、东非国家;白蕃商主要来自今天阿拉伯半岛海湾各国、中亚部分国家、小亚细亚、北非、西班牙南部等地。他们开辟了到达泉州的海洋航线,开展海洋贸易,为包括泉州人在内的中国人运来香药、纺织品,也从中国输出瓷器等各种生活器具、丝绸、漆器、金

属器皿等。宋代泉州黑白蕃商是10-13世纪海洋贸易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也是宋元时期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建设者和践行者、世界文化的传播交流使者。

注释:

①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卷12《福建路·泉州》,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07-208页。

②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点校:《方輿胜览》卷12《福建路·泉州》,第208页。

③参见: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王庆松:《20世纪宋代海外贸易研究综述》,《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许文刚:《宋代蕃商研究综述》,《鄂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④参考: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原载台北《史学汇刊》第8期(1977年),第83-110页),台湾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1辑,1979年印行,第223-262页;陈高华:《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兼论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海交史研究》1980年第1期;[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三《五代·北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8-243页;[韩]李镇汉著,李廷青、戴琳剑译:《高丽时代宋商往来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⑤如,[日]桑原鹭藏著,陈裕菁译订:《蒲寿庚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麻健敏:《略述南宋对泉州蕃客的政策——兼论阿拉伯商人对繁荣泉州所起的历史作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廖大珂:《宋元时期泉州的阿拉伯人》,《回族研究》2011年第2期;等等。

⑥《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互市舶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561页。

⑦蔡襄:《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卷20《移泉州谢上表》,《宋集珍本丛刊》第8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102页。

⑧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595页。

⑨张纲:《华阳集》卷1《连南夫知泉州》,《宋集珍本丛刊》第38册,第422页。

⑩王十朋:《宋王忠文公文集》卷6《泉州到任谢表》,《宋集珍本丛刊》第44册,第2页。

⑪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中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48页。

⑫许应龙:《东涧集》卷6《刘炜叔知泉州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67页。

⑬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68《外制·胡

先仍旧直秘阁知泉州》，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02页。

⑭李士瞻：《经济文集》卷1《与泉南左丞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41页。

⑮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49-753页。

⑯苏天爵辑：《国朝文类》卷41《征伐·海外诸蕃·爪哇》，《四部丛刊初编》第2027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36页a。

⑰梁克家著，陈叔侗校注，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淳熙《三山志》卷19《兵防类二·诸寨土军》，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97、300-301页。

⑱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53-754页。

⑲傅宗文：《宋代泉州港的崛起与港口分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增刊。

⑳乾隆《晋江县志》卷16《词翰·罗城外壕记》，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470页。

㉑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29《江南道五》，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20页。

㉒《新唐书》卷41《地理五·江南道》，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5页。

㉓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4《规制志上·城池》，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298-299页。

㉔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4《规制志上·城池》，第302页。

㉕乾隆《晋江县志》卷16《词翰·罗城外壕记》，第470页。

㉖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49-750页。

㉗泉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海丝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史迹剪影》19《江口码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年版，第88页。

㉘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49页。

㉙傅宗文：《宋代泉州港的崛起与港口分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增刊。

㉚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51-752页。

㉛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3《桥渡附文·石井镇安平桥记》，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㉜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1《山川潮汐志》，第19页。

㉝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1《山川潮汐志》，第33页。

㉞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1《安平源流志》，第11页。

㉟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6，元祐二年十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9889页。

㊱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24《杂志·古迹类》，第1764页。

㊲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2《地理志》，第60页。

㊳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24《杂志·古迹类》，第1764页。

㊴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志》卷9《交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8页。

㊵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53页。

㊶泉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海丝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史迹剪影》20《石湖码头》，第92页。

㊷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8《对越甲藁·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宋集珍本丛刊》第75册，第753页。

㊸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2《輿地志中·山》，第105-106页。

㊹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志》卷9《交通》，第820页。

㊺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5《规制志下·桥渡》，第431-432页。

㊻黄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卷12《地理·潮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2版，第330页。

㊼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志》卷9《交通》，第820页。

㊽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1《山川潮汐志》，第33页。

㊾安海乡土史料编辑委员会校注：《安平志校注本》卷1《山川潮汐志》，第33页。

㊿黄仲昭修纂，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八闽通志》卷8《地理·山川》，第208页。

①《旧唐书》卷198《西戎·康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0-5311页。

②郑阳、陈德勇：《扬州新发现唐代波斯人墓碑意义初探》，《中国穆斯林》2015年第3期。

③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卷91《帝王部·赦宥十》，南京：江苏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3页。

④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90《闽一·太祖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19页。

⑤佚名撰，张剑光、孙励整理：《五国故事》卷下，《全宋笔

记》第1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253页。

⑤吴任臣撰,徐敏霞、周莹点校:《十国春秋》卷94《闽五·武肃王审邽子延彬》,第1363-1364页。

⑥于兢:《琅琊忠懿王德政碑》,《全唐文》卷841,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848页。

⑦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03页。

⑧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5-6,第4205页。

⑨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3《外国门下·航海外夷》,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6-127页。

⑩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序”,第1、3页。

⑪吴幼雄:《澎湖航线研究》,《福建学刊》1989年第4期;傅宗文:《宋元时期的闽台交往与东洋航线》,《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朱克宇:《9-17世纪闽台菲的交往与“东洋航路”的形成及发展》,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21年。

⑫Hugh R. Clark, Community, Trade, Network: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i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1-119.

⑬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595页。

⑭张栻:《新刊南轩先生文集》卷37《少傅刘公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第60册,第215页。

⑮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30《送叶泉州二首》,《宋集珍本丛刊》第35册,第141页。

⑯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40《渝州县官僚文》,《宋集珍本丛刊》第76册,第410页。

⑰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68《行状·西山真文忠公》,第6507页。

⑱楼钥:《攻媿集》卷63《代谢除提举福建市舶启》,《四部丛刊初编》第1144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0页b-11页a。

⑲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宋集珍本丛刊》第44册,第715-716页。

⑳[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贺圣达审校:《剑桥东南亚史》I,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㉑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2《外国门上·占城国》,第77页。

㉒《旧唐书》卷197《南蛮·林邑传》,第5269-5270页。

㉓刘恂:《岭表录异》卷上,《丛书集成新编》第9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14页。

㉔《旧唐书》卷197《南蛮·林邑传》,第5269、5270页。

㉕朱彧著,李伟国整理:《萍洲可谈》卷2,《全宋笔记》第2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页。

㉖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2《外国门上·占城国》,第77页。

㉗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9页。

㉘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㉙《旧唐书》卷197《南蛮·真腊国传》,第5271页。

㉚周达观原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六)《人物》,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1页。

㉛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麻逸国》,第142页。

㉜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三屿》,第145页。

㉝汪大渊原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古里佛”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7-328页。

㉞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南毗国》,第67、68页。

㉟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细兰国》,第52页。

㊱周去非著,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卷2《外国门上·故临国》,第91页。

㊲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层拔国》,第100-101页;卷上《志国·弼琶罗国》,第102-103、105页。

㊳岳珂撰,吴企明点校:《程史》卷11《番禺海獠》,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5页。

㊴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宋集珍本丛刊》第44册,第715-716页。

㊵《宋史》卷489《外国列传五·三佛齐国传》,第14088-14090页。

㊶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胡茶辣国》,第72、73页。

㊷《宋史》卷490《外国列传六·大食国传》,第14118-14121页。

㊸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宋集珍本丛刊》第44册,第715-716页。

㊹岳珂撰,吴企明点校:《程史》卷11《番禺海獠》,第127页。

㊺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大食国》,第95、97-98页。

㊻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瓮蛮国》,第108页;参考李万权、邱克《新绘〈郑和航海图〉的地名补释和航线分析》,《大连海运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⑧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勿拔国》,第104页。

⑨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大食国》,第92-96页。

⑩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大食国》,第90页。

⑪《旧唐书》卷198《西戎·大食传》,第5315页。

⑫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记施国》,第108-109页。

⑬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芦眉国》,第116-117页。

⑭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木兰皮国》,第117-120页。

⑮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斯加里野国》,第133-134页。

⑯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单马令国》《志国·渤泥国》《志国·麻逸国》《志国·三屿》,第9、43、136、141、144页。

⑰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阁婆国》《志国·渤泥国》《志国·麻逸国》《志国·三屿》,第9、55、136、137、141、144页。

⑱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真腊国》《志国·占城国》《志国·三佛齐国》《志国·层拔国》《志国·渤泥国》,第19、9、36、100、136、137页。

⑲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三佛齐国》《志国·佛啰安国》,第9、36、47页。

⑳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真腊国》《志国·三佛齐国》《志国·阁婆国》《志国·渤泥国》,第9、19、36、55、136页。

㉑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三佛齐国》《志国·阁婆国》《志国·渤泥国》《志国·麻逸国》,第36、55、136、141页。

㉒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渤泥国》,第136页。

㉓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真腊国》《志国·三佛齐国》《志国·细兰国》《志国·阁婆国》《志国·大食国》《志国·吉慈尼国》《志国·渤泥国》《志国·麻逸国》,第9、19、35、52、55、90、112、136、141页。

㉔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细兰国》《志国·大食国》《志国·芦眉国》,第9、51、90、116页。

㉕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

城国》《志国·真腊国》《志国·阁婆国》,第9、19、55页。

㉖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大食国》《志国·芦眉国》,第9、90、116页。

㉗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单马令国》,第43页。

㉘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占城国》《志国·阁婆国》,第9、55页。

㉙赵汝适原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志国·记施国》,第109页。

㉚《宋史》卷167《职官七·提举市舶司》,第3971页。

㉛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4,第4216页。

㉜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0,第4206页。

㉝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财赋二·418市舶司本息》,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0页。

㉞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19,第4213页。

㉟《宋史》卷185《食货志下七·香附》,第4537页。

㊱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财赋二·418市舶司本息》,第330页。

㊲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5,第4216页。

㊳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1,第4214页。

㊴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5-26,第4217页。

㊵胡寅:《斐然集》卷13《陈楠直龙图阁知泉州》,《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50页。

㊶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29,第4218页。

㊷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职官44之33,第4221页。

㊸万历《重修泉州府志》卷10《官守志下·古今宦迹·宋·真德秀》,第830页。

㊹刘克庄著,辛更儒笺校:《刘克庄集笺校》卷168《行状·西山真文忠公》,第6507页。

㊺柯劭忞:《新元史》卷177《蒲寿庚传》,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361页。

㊻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第595页。